

## CH1

# 新聞、公共關係與權力： 領域的描繪

---

*Simon Cottle*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日益強調「促銷的時代」(promotional times)。現今，國家、團體組織、各式各樣的壓力團體以及新興社會運動，皆藉由媒介來傳遞他們自身的訊息，以求得各自的組織利益、集體目標與公共合法性。因此，媒介消息來源與公共關係的研究，會帶領我們到達核心，這個核心攸關於媒介與更廣泛結構及媒介權力體系之間關係的焦點與討論。這項研究引領我們重新思考媒介相關權力與其他組織利益間的關係。同樣地，也引領我們重新思考連結兩者的機制之本質，而上述兩者也透過此機制來產生互動。也許，會令人感到些微驚訝的是，媒介消息來源與公共關係的研究，正快速地在比其範圍更廣闊的媒介傳播研究領域內，發展成實證研究與理論創立的重要研究區塊。

在定義上，新聞學領域在衝突傳播上，可以說是位居樞紐，並與周遭關於媒介影響、再現及參與的競爭和爭辯聲音息息相關。誰取得媒介近用權，為什麼取得以及如何取得，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基本問題，包括媒介參與的本質、被媒介中介的公民身分之過程與形式、媒介表現的議題，以及權力運用在新聞媒體與其消息來源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等問題。公共關係在現今更

加廣泛的促銷文化中，也占據了中心位置。在此處，公共關係被定義為「為追求組織的利益，而進行一種對公開形象與對外資訊的極致管理」，其工作與制度已於二十一世紀後演變為一種主要企業。的確，近幾年其成長已採納指數分配額的方式來觀察。公共關係企業的崛起，及與其有關聯的大批人員諸如公共關係顧問，以及受政府、法人團體、壓力團體與名人雇用所謂的「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皆反應一種逐漸提升之媒體知覺與「媒介化」(mediatised)社會的興起。在媒介化社會中，商業利益與文化認同表面上彼此競逐媒介空間，並策略性地動員溝通權力的形式。

本書將目標放在：引進在這個領域內工作的研究者所發表之某些最重要的觀念與經驗性發現。如此一來，將幫助我們更加瞭解權力在消息來源與新聞業之間，所扮演的複雜角色關係。後面的章節是由新聞領域中主要的國際研究者所撰寫，他們的貢獻是呈現了各種知識來源領域與媒介公共關係策略，也呈現了獲取近用權與參與權的特徵形式與機會。本書涵蓋的特定區域包括：

- 近年來公共關係的急遽成長及其對新聞產製的影響；
- 以國內的政治意義為依據而制定的官方資訊管理策略；
- 政黨，以及在國家與地方上操作之受中介的「政治編造」(spin)；
- 新聞記者隨著歷史變遷的本質，以及由戰爭和國際性危機觀點出發的消息來源策略；
- 非政府組織(例如：半自治非政府組織、貿易聯盟、自發性團體與慈善機構)的比較分析，以及他們對保障媒介近用權所做的努力；
- 環保壓力團體的溝通策略、生態行動主義者與網路行

動主義者的溝通策略；

- 小報化的電視節目以及文化再現形式；
- 電視新聞與當前事務節目的「深思熟慮型」結構，以及其如何造成截然不同的影響：使關於公共參與(public engagement)的觀點與聲音成形或失敗。

藉由這些方法，本書檢視了媒介消息來源的涉入，以及橫跨各種組織性活動領域的公共關係策略，而這些組織性活動領域則有不同的集體利益，並且橫跨不同的時間。因此本書提供了一個比較基礎，由此基礎來評價互相競爭的理論性與詮釋性框架，以及評價分析取向的不同層次。比起狹隘地將公共關係理解為「有效」溝通的專門性組織實現，此分析遍及的範圍更加廣泛(批判也更加深入)；此外，相對於尋常實例，此分析也包含了更廣闊的、探討消息來源之研究的理論取徑。本書設計的目的在於鼓勵媒介與消息來源互動，以及公共關係形式裡的多面向本質、動態關係與複雜性，一種於概念上更具細微差異、理論上更為精密的正確評價。最後，本書的九個章節，提供讀者一張入場卷，使您得以進入關注歷史性變遷、組織複雜性，以及政治上難以預測之領域的最新思想與研究發現。

藉由描繪理論取徑與實證研究的概略輪廓，以及定義關於媒介消息來源與媒介化公共關係之研究的爭論，第一章替隨後的其他章節設定了場景<sup>①</sup>。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於過往媒介溝通研究的連續關聯，可以獲得更好的理解；此外，也能夠鑑賞在溝通探察這塊主要區域裡，更新近之研究者的豐富成果。

---

<sup>①</sup> 此介紹性的章節，柯特於首版著作中(2000c)更新並重新組織部分概念。另請參閱曼寧(Paul Manning)的精湛討論《新聞與新聞來源：關鍵序論》(*News and News Sourc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001)

## 壹、媒介溝通：研究傳統

媒介消息來源涉入的問題引發了一些基本關注：誰被委派去針對社會事務以及更廣泛的衝突發言或發聲、這項溝通的應得權利又是如何確切地被引導著，以及這項權利又是經由誰來認可。諸如「代表性」、「社會與文化權力」和「公民身分」等深奧的問題因而被全數提出。簡而言之，這個問題即是：誰的聲音和觀點建構與形成了新聞論述，成為新聞媒介民主觀點的核心以及基進的關切焦點。傳統上來看，自由民主理論包含一個對於新聞代表性與近用的固有關懷。此處，報業的自由(以及更廣義來說，新聞媒介的自由)必須受到保護，如此一來，才得以傳播有異議的觀點、促進意見形成，以及維持「具代表性的」民主進程(Mill, J. 1997; Mill, J. S. 1997)。一直以來，批判理論的變體，就其角色而言，都是越來越明確的，並且注意到事實上新聞媒介是如何例行地使用與推崇菁英份子對「真實的定義」。有個說法是，這些提供了領導階級的支配利益、正當化社會的不平等以及/或者阻撓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行動(例如 Golding and Murdock 1979; Gitlin 1980; Hall 1982;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自由論者和批判論者都以不同的方法，指出對於媒介消息來源涉入以及媒介代表性的基礎，甚至是重要的關切點。在新聞舞台上，哪些人的聲音佔據主導地位、哪些人的聲音彼此競爭和辯論，以及哪些人的聲音被邊緣化或者被迫噤聲，都是攸關共同利益的問題。社會團體和社會利益如何受到定義，以及如何被象徵符號呈現出來，也是媒介消息來源使用的一部分。不論社會團體是否被宣稱具合法代表性，或者被象徵性地定位為「他者」、被貼上偏差者的標籤或者直接遭到漠視，當然都

會產生一些深遠的結果，這些結果呈現於一些媒體研究上，例如關於青少年次文化(Cohen 1972)、少數族群(Van Dijk 1991)、持不同政治意見者以及「風險社會」裡的「恐怖分子」(Gerbner 1972)，與受害者的代表性研究(Cottle 2000a)。

因此，前述情形很大程度上依賴以下的問題而定：我們如何針對新聞媒介、消息來源與更廣大社會之間的關係，來進行概念化與理論化；還有，我們如何理解圍繞與形成這些過程的機制與意義，以及理解社會代表性與進入管道的型態。傳統上而言，自由民主理論與批判理論的變體，監視著(以概略性的辭彙來說)一塊受到普遍關注與爭論的區域，這塊區域在媒介裡所扮演的角色，是替周遭的政治利益(或者說精英觀點)發聲，並且替公眾意見的構連(或者說意識型態上的捏造)發聲。這些觀點也有助於形成更近期以來的、關注於媒介趨向成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爭論(Habermas 1989)。公共領域是一塊由媒介組成的空間，所有民眾都可以近用，而在其中充斥著公開辯論和理性思辨，有助於公眾意見與政治意願的形成(Elliott 1986; Garnham 1986; Curran 1991; Frazer 1992; Hallin 1994; Dahlgren 1995; Murdock 1999; Husband 2000)。雖然我們承認公共溝通的本質在意識型態上是較不封閉的、在個體上也較不開放，但在此處，理論家的爭辯就如同各種權力(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的操演一樣激烈，而這些爭辯是關於權力操演如何以各種方式適應和形塑(或者說侵蝕)，今日媒介對

6 構成「公民身分」、「理性的」意見形成以及「共識」的形式上的貢獻。這種將「媒介」視為鬥爭場域、在歷史上更微妙、經驗上更分殊，以及政治上更具爭議的觀點轉向(在此轉向中，偶然性與決定性同時被視為形成了物質的與散漫權力的操作，以及具代表性的結果)，替許多媒介溝通領域中的近期研究奠定基礎，包括關於媒介與消息來源間的互動研究。在社會

與社會理論兩者的發展中，皆增加了新的變化層級，並且迫切關注於媒介趨向成為「公共領域」。

## 貳、新聞時間：具爭議的領域

當代的社會理論家堅持一個看法：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後傳統以及不確定的時代。這些晚期現代社會裡的每一項典型特色都指出，媒介在表達大量互相競爭的利益與相關論述(這些利益和論述是為了爭奪公共代表性)時，與日俱增的向心性。新溝通科技與傳送形式輔助的全球化過程，已經加速了時間與空間的瓦解，並強化遠距經營的社會關係，並導致全球「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的興起(Castells 1996)。全球化也促進了資金、人口與文化的快速流動(Lash and Urry 1994)，並且造成國家與它們控制、管理經濟與政治過程之能力的雙雙崩解，無論是在領土範圍之內外(Held *et al.* 1999)。如此一來，當代世界產製了新的經濟與政治衝突，惡化了國家正當性的問題，以及促使「公共關係國家」(public relations state)的崛起(Deacon and Golding 1994)。

全球化也增強了現代化的脈動，包括這個世界的覺醒，在其中信仰和傳統成為韋伯工具理性「鐵籠」(iron-cage)裡的主題。顯著的個人主義、消費主義和技術理性破壞了曾經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與信仰體系。然而，在「後傳統時代」裡，各種傳統不必然會消失，而是反常地，可以被假定為一種回應現代化/全球化力量、更加獨斷且鬥志旺盛的立場。重點是，這些力量被期望要以理智的、自我反省的方式來防衛自身，並且無法單獨在傳統的基礎上，取得不受質疑的信奉(Giddens 1994)。傳統的階級團結與根植於大量生產之社會關係中的政

治忠誠，在彈性化的新式社會生產以及消費文化型態方面，也已經愈趨衰弱；而這導致新的認同政治形式、新的社會運動以及其他國會外部(extra-parliamentary)之「次級政治」(subpolitics)的出現。在文明社會裡，這些構成了一個「政壇」(the political)上的擴張領域(Hall and Jacques 1989; Mouffe 1996; Beck 1997; Castells 1997)。由於不同的國家利益、公司利益和團體利益，以及不同的文化認同互相競爭、爭辯，加上透過媒介「公共領域」裡的溝通行動提升了價值與目標的多元化，這樣的社會轉變產生了百家爭鳴的論述(Habermas 1996)。

現今日益增加的「社會反身性」，助長了相互競爭之論述的豐富度，社會反身性質疑了知識主張與專門技術，包括科學的「必然性」以及關於「風險」之技術專家治國論的管理經營，這些風險則是在晚近現代性裡、具備潛在災難性的「捏造之不確定性」，現在正圍繞著地球並且有可能影響尚未出生的世代(Beck 1992; Beck *et al.* 1994)。紀登斯維持他的看法：像社會變遷如此強大的力量，已經引起「本體論上的不穩定」感(Giddens 1990)，刺激了環保意識，以及在本土與全球層級上進行之草根性抗議活動(這類抗議活動總是在大眾媒介的聚光燈下結束)的興起。上述之事促使了「次級政治」的(一種從底層而來的政治)成長，而次級政治則質疑了經濟成長的「規範的」(normative)目標以及經過國家認可的環境開發。當然，強大的國家以及個體皆居住在不確定的時代，就如同在二〇〇一年大家共同見證到的九一一事件(Zelizer and Allan 2002)。這促成了國際間「超政治」(suprapolitics)(也就是由上層而來的政治)的更新成果，另外，這也緊密依賴於大眾媒介的合法競爭與其公共關係的潛能。

前述指出了某些深層的社會轉變過程，這些轉變過程在現今被視為構成媒介近用與公共代表性等眾聲喧嘩且豐富論述

的基礎。大眾媒介組成了一個主要的競爭場所，在其中，互相競爭的利益與包含「基進的多元主義」(radical pluralism)的觀點，皆致力於涉入溝通行動，並藉由「公開」或「緘密」的策略，來追求公眾肯認、正當性以及策略目標(Ericson *et al.* 1989)。然而，在新聞表述的過程裡，理論家是如何完成研究、理論化並且加以解釋媒介消息來源的涉入情形？這其中牽涉了什麼重要且錯綜複雜的事物？而在今日，我們又需要追問哪些關鍵問題？

以在理論上更為相近的辭彙來說，接下來的部分詳細描繪了不同的典範與取徑，這些典範與取徑幫助我們界定出目前的研究領域，並且關注此領域對於媒介與消息來源間之互動與參與。首先，廣義的社會學典範一般關心消息來源如何透過媒介近用，策略性地追求他們的組織利益，並且將目標放在保障「定義上的優勢」(definitional advantage)。其次，廣義文化學典範則尋求媒介描述與近用的代表本質，並檢視「象徵性權力」(symbolic power)的問題。第三，突然興起的「溝通式」典範，是由前兩種典範發展而來，卻背離這兩個起源。它更加明確地聚焦於：「傳播權力」的形式如何在媒介中被呈現出來，以及隨著相關偶發事件(不論是關於「儀式性過程」的潛在轉變面向，或是結合了現場中介的衝突狀況與公開表演的「風險」之某特定結果)的顯著體認，傳播權力又在媒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儘管這三種典範傾向之間確實存在著重疊部分，然而每一種典範傾向卻追求不同的問題，且著重於新聞媒介與消息來源互動的不同面向。重要的是，不論是在策略面、象徵符號面或是傳播面，每一種典範又都適用於闡明權力影響媒介與消息來源間關係的各種面向。這些典範將會被依次更新，但是，在這之前，先簡短地重新瀏覽符號互動論的傳統是很有用的。符號互動論這個較早期的社會學取徑，已被證實為具有發展性，



其為往後關於消息來源策略的研究、媒介代表性之象徵本質的文化取向研究、溝通行動研究，以及媒介衝突者之動態本質的研究，留下一些頗具影響力的觀點。。

### 參、深具發展力的起端：符號互動論

符號互動論的社會學傳統(Blumer 1969, 1971)致力於探索標記、象徵符號以及意義如何影響人類的互動與理解。諸如研究：「局外人」如何被標籤化為偏差者(Becker 1963)、「他者」如何被污名化(Goffman 1963)，以及「道德事業家」、「支配能動者」與「公眾恐慌」(folk devil)如何以道德恐慌作為號召特色(Cohen 1972)，這些深具影響力的研究，直至今日已經影響了無以計數的研究。在污名化偏差者的極端研究案例中，社會團體變得喪失人性且妖魔化，他們的目標也已變得去政治化、去正當性(Cohen and Young 1981)。關注於標籤化與象徵記號的早期社會學取徑，影響了文化研究的早期發展(Hall 1974)，但是它也促進了一個更具策略的社會權力觀點。貝克(Becker 1967)提出「可信度階層」(hierarchy of credibility)的概念，幫助我們描繪出新聞媒介內(與橫跨無數實證研究所提供的文件證明內)菁英近用的明顯型態，另外，他也參考了更廣大社會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習俗，來解釋這個概念。

在任何分等級的團體體系裡，參與者視此為既有的：位階最高之團體的成員擁有權利去定義事物真實的模樣。並且因為等級和地位這類事情是包含於習俗裡，這個信念具有道德特質；因此，可信度以及被得知的權利，會經由體系的分級而分散在不同處(Becker

1967: 241)。

貝克的構想雖然是不錯的聯想，然而在理論上仍舊發展的不完全。這個構想提供了一個太過僵固、與歷史無關的「社會階層」觀點和文化「習俗」，並且因而將一些問題視為理所當然，這些問題包括媒介在調解變遷、衝突與相互競爭的利益中，扮演什麼角色。然而，當這個概念與布魯默(Herbert Blumer)對於「集體定義」過程的觀點，以及所謂「社會問題」的「歷程」兩者相結合時，一個關於新聞近用的、更加具有過程性與策略性的觀點便於焉開展(Blumer 1971: 303)。當「社會問題」透過布魯默之「興起」、「正當化」、「動員」、「成形」、「轉變」這五個辨別階段而持續開展時，主要參與者的策略性活動也變得十分重要，新聞媒介(其為「公共討論的主要競逐場所」之一)也一樣(Blumer 1971: 303)。在一個顯然更近期關於新聞消息來源干擾(見底下)的理論位置之聲明中，布魯默有效地把注意力放在與造成社會問題的動態過程與政治偶然事件。

問題如何被定義、如何被迫回應覺醒的情緒、如何被  
詳細描述，以保護既定利益，以及如何反思策略性位  
置與權力的運用，以上這些全部都是適切的問題，顯  
示出行動動員過程的重要性(Blumer 1971: 304)。

9

於是，符號互動論裡頗具發展性的概念，例如「標籤化」、「可信度階層」、「策略性位置與權力的運用」與「行動動員」，貢獻了有用的分析工具，可用來協助詢問媒介消息來源策略、媒介代表性的象徵本質，以及探索溝通行動的互動形式。然而，猶如之前提到的理由，這些概念在理論上仍舊發展不完全，無法成為精確的機制，並藉由新聞媒介，來連結特定的「社

會問題」。

如同柯恩在《公眾恐慌與道德恐慌》(*Folk Devil and Moral Panics*, 1972)一書中所闡述的，道德恐慌理論承諾要彌合這道溝口。媒介常聳動化、象徵化、誇大、扭曲「疑難重重」的事件與社會行動，而道德恐慌理論則是在探索媒介是如何透過這種放大的過程，來引起公眾焦慮。這種過程接著將導致社會反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種強制的法律秩序鎮壓)與重興一種「社會控制」文化的過程。因此，柯恩的道德恐慌理論在符號互動論者對於標籤化的想法，以及新馬克思主義論者對於意識型態的正當性想法之間，提供一座溝通橋樑。但是，我們可以再次注意的是，究竟這些精確的機制如何將新聞媒體與一個分隔開來的、更廣闊的「社會控制文化」作連結；而這種文化在實證上是尚未被完全探索的，就如同影響形成所謂的「支配能動者」與「道德事業家」人員、新聞媒體的禮儀，以及道德障礙的可能動機，也尚未被完全探索。此外，在今日的促銷時代裡，我們不必再假定優勢的社會利益全都自行其是；昨日的「公眾恐慌」已逐漸學會在今日的媒介舞台上「反擊」(McRobbie 1994)。

#### 肆、媒介消息來源與策略權力

關於媒介消息來源與新聞消息來源之間互動的社會學研究，包含了某個範圍內具有影響力的理論取徑：新馬克思主義、新聞產製的社會學以及消息來源領域的社會學。每一種取徑都提供重要的見解與概念化，使我們更進一步理解媒介消息來源權力的策略性本質，以及消息來源對新聞論述世界的干擾。

## 一、新馬克思主義與正當化

格拉斯哥大學媒體小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 GUMG)的早期研究在諸多方面都與霍爾(Stuart Hall 1975a, 1978)和他同事從事的研究很類似。這些研究都建立在符號互動論的觀點上,也都受到新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是受支配而建構的觀點所影響,此外,它們也都致力於超越互動論者「標籤化」的觀點,而轉移到意識型態的「正當性」觀點。重要的是,這些研究皆確認了一個支配性的「世界觀」或「主流文化」,以及建構好的階層近用權所扮演的角色,它們分別是關鍵機制,可以用來解釋新聞媒介獨尊主流意見的現象。因此,根據格拉斯哥大學媒體小組的研究顯示:

電視新聞是種文化人造品,它是一連串因社會性考量而大量製造的訊息,夾帶許多在文化上具優勢地位、與我們社會有關的假想。從新聞播報員的口音到鏡頭上的遣詞用字;從要訪問誰到該問什麼問題,經由故事的篩選再呈現在新聞快報裡,這些都表現出新聞是高度中介化後的產品(GUMG 1976: 1)。

這些「文化上的主流假定」被認為影響了新聞記者的觀點,接著影響到新聞近用之體系型態與優先型態:「近用權利是被建構的,而且具有某種程度的階層性,強大的團體與特定個人擁有特權,得以例行地進入新聞本身,並且深入新聞產製的方法與手段」(GUMG 1980: 114)。針對新聞媒介與其消息來源,霍爾提供了稍微不那麼僵固的說法,他認為:「廣播人員和廣播電視台掌握通道,控制溝通管道,在菁英權力(例如社會的、

經濟的、政治的與文化的)與大眾閱聽人之間扮演中介角色」(Hall 1975a: 124)。霍爾及其同事也提供了成對分岔(twin-pronged)的取徑，來研究媒介近用權利與複製權力強大者意見等問題。

這兩種新聞產製的面向 亦即違反正常工時而持續工作所帶來的實際壓力，以及公平客觀的專業要求 結合之後產生了一個結果：那些處於強大且被賦予特權之團體位置的人，有系統地被組織起來並過度使用媒介(Hall *et al.* 1978: 58)。

在這些方面，霍爾等人維持這樣的看法：新聞媒介複製強權者的聲音，使其成為所發生事件的「初級定義者」。雖然在新聞媒介裡，「初級定義者」容易受到有限機會的挑戰，但是經由例行性近用與新聞正當化，初級定義者掌控了論述領域，並且設定爭論持續的期限。強權者的聲音被轉譯為不同報紙的「公共用語」(public idioms)，因而適用於賦予報社「普遍的力量與共鳴」。對格拉斯哥大學媒體小組與霍爾兩者來說，關於新聞「中介」的問題，最後歸結於「社會的文化性主流假定」(GUMG 1976: 1)，以及不同新聞出口如何因優勢且具共識性的言外之意而有所變化(Hall *et al.* 1978: 62)。在兩方的研究裡，新聞中介的概念被有效地化約至意識型態，以及轉化與傳送的觀點，而這留下極小的空間，可以去考量內存於不同記者的文類裡，以及與不同方式組織起來的消息來源領域有關的一些特徵形式、分殊的籲求與推論的可能性。在我們單純地將新聞產製者定位為「不知情地、無意識地」、「支持再生產一個主流的意識型態推論領域」服務之前，我們必須瞭解更多有關內在於與存在於新聞消息來源與新聞產製者之間的互動(Hall 1982: 88)，這

點在格拉斯哥大學媒體小組成員的近期研究裡，也已獲得認可(Eldridge 1993; Miller *et al.* 1998a)。

「主流文化」的概念，也許就像那些與它相關的「主流意識型態」一樣，總是過於概化、模糊而無法替代有關操演中力量複雜性的分析(Abercrombie *et al.* 1980)。然而，這些研究中最嚴謹的限制，不是在檢視影響新聞產製與新聞消息來源的專業與組織領域之複雜性與互動。儘管格拉斯哥大學媒體小組部分(中途失敗)的生產研究也是如此，但仍自稱為「事先考察殊異領域」(GUMG 1976: 58)，此外，霍爾對官僚式例行事物之角色，與獲取初級定義者時所需的客觀性這項專業意識型態，都給予理論上的認可。為了對前述面向之「策略位置與權力操演」的角色有更加紮實的正確評價，我們必須關注其他事項。

## 二、新聞產製的社會學：在螢幕之後

新聞產製社會學的研究(這類研究大多花費相當多時間在該領域，並且援引各種新聞出口管道作為基礎)，已經揭露了某些事物，這些事物通常隱蔽了在新聞產製與例行專業實踐之「黑盒子」裡的內在運作，也隱蔽了形成其運作的組織性與文化性規範(Epstein 1973; Altheide 1976; Tuchman 1978; Schlesinger 1978; Golding and Elliot 1979; Gans 1979; Fishman 1980; Ericson *et al.* 1987; Cottle 1993a)。上述作者的研究發現有助於闡明消息來源與新聞間的互動。

舉例來說，根據塔克曼的觀察，新聞在組織方面是官僚政治的實現，隨時準備好「常規化不可預期之事」以及「馴化新聞環境」(Tuchman 1973,1978)。在這裡，新聞製造的過程必須確保有足夠數量的新聞，並包含某個由許多新聞主題組成的特定混合主題，這些新聞被即時產製與包裝，然後置入一個預先

確定且受到專業理解的組織形式中(Rock 1981)。這種官僚式目標使得新聞室的分工、新聞記者分配「新聞路線」(news beats)的組織，以及新聞科層管理的建立成為必要；此外，為了有助於記者「識別」、「生產」、「獲得」以及「證明」他們的新聞報導，發展「前例字彙」(vocabulary of precedents)也成為必要(Ericson *et al.*1987: 348)。

一般認為，這些對於新聞工作的實際反應，導致新聞工作有系統地接近強大且資源豐富的機構，並獲取其對事件的定義，導致資源貧乏的社會團體與利益被邊緣化(Goldenberg 1975; Gitlin 1980)。社會上的主要機構(例如政府、法院與警局等等)因此被定位在為社會事物發聲的位置上，掌控了物質資源，並且擁有定義具備新聞價值的事件，與對其發表獨斷意見的權威性。他們也具有組織能力，可以專業地管理大量新聞素材，或者甚至可以產製他們自己的「假事件」(pseudo-event)(Boorstein 1964; Sigal 1973)，亦即透過在官僚政治上有用的(在商業上亦有利益的)「資訊津貼」(information subsidies)(Gandy 1982)(譯者按：此指消息來源會利用投書、新聞稿等方式，讓媒體從業人員快速取得資訊，減少採訪等各項成本，並控制議題設定)之供應，來促進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新聞報導。摩樂契(Harvey Molotch)與雷斯特(Marilyn Lester)則認為，相較於那些必須訴諸「分裂性近用權」(disruptive access)才得以進入新聞媒介的人，這類的「事件促動者」(event promoters)享有進入新聞媒介的「慣常性近用權」(habitual access)。後者只能夠藉由創造驚奇、震撼，或稍加粗暴的「動亂」形式，闖入新聞產製持續進行之流程中來「製造新聞」(Molotch and Lester 1981: 128)。

很明顯地，新聞組織不能符合社會非當權者的需求。專業新聞播報員與特派員每日進入獲取主要來源機構的專門領域中，協調出建立在信任與互惠的長期交易關係(Tunstall 1970)，

而此交易關係經常被認為是導致新聞妥協與新聞室依賴的原因(Chibnall 1977)。微妙的社會化過程產生了團體內的規範，這些規範築基於「對手-同事」關係的互動(Tunstall 1971; Dunwoody 1978; Fishman 1981; Pedelty 1995)，以及消息來源之間的社會化上。在前述的這種社會化裡，新聞記者逐漸穩定地沉陷於他/她主要消息來源的專業世界觀；例如，不論是警界(Chibnall 1977)或軍方(Morrison 1994; Pedelty 1995)都會結合起來，減少來自他們消息來源之中歧異的新聞觀點。

此外，在競爭愈烈(Ehrlich 1995)、愈受商業驅使的新聞環境裡(Altschull 1997)，「新聞探索的市場模型」很可能壓倒愈趨神話般存在的「探索的記者模型」，或壓倒深入且獨立的調查性新聞報導(McManus 1997: 287)，而替仰賴官方消息來源的組織性依賴，增加一些商業刺激。簡言之，根據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說法，「每日新聞報導的基礎內容，重點不在於該議題是否在國家、州或者地方的層級上發生，而是取決於記者與官員的互動上」(Schudson 1991: 148)。

客觀性的專業意理也促使專業向菁英觀點屈膝。正如索羅斯基(John Soloski)所主張的：「客觀性是最重要的專業規範，而更多新聞專業性的特殊面向，諸如新聞判斷、消息來源的選擇，以及新聞路線的結構，都是源自客觀性」(Soloski 1989: 213)。經過社會化的新聞記者，會追求(在哲學上也難以理解的)「客觀性」，來解決實際上的平衡、公平與公正等問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客觀性)，更重要的是，為了讓他們的消息來源、閱聽眾/讀者與同事，認為他們試圖達到這個目的，新聞記者會進行「策略性的儀式」(Tuchman 1972)，尋求他們認為有見識的，以及受社會認同之可為具新聞價值事件發聲的權威聲音。

儘管這些廣泛的發現具有深刻見解，他們卻傾向誇大跨越



不同新聞形式生態學之新聞生產的一致性，以及在新聞舞台上找到一群不變的新聞消息來源(Eliasoph 1988; Cottle 1993b, 2000b)。對於新聞的不同文化形式、與它們相關的專業實踐，以及這些如何影響新聞近用之型態與過程的緊密關注，意味著媒介近用的議題不可能被全部簡化為官僚的例行公事，或是一個對於廣義的「客觀性」專業意理的假定贊同，因為其他的文化因素也同樣(實際地)發揮著作用。

### 三、新聞消息來源的社會學：在產製者之後

假如新聞組織與專業實踐的研究，指出了牽涉獲取新聞舞台上各類意見聲音的官僚、專業，以及(某種程度來說)文化面向，那麼，其他研究也會從消息來源的觀點，致力探究消息來源如何干預新聞劇場。甘斯(Herbert Gans)在分析新聞產製者的評論之後總結道，消息來源的干預與媒介間的「拔河」(tug of war)能否成功，端視四項條件而定：(1)消息來源的動機；(2)權力；(3)提供合適資訊的能力；(4)與新聞記者的地理鄰近性和社會鄰近性。

闡述早期消息來源研究的史勒辛格(Schlesinger 1990)，主張一個更加「外部途徑的」(externalist，譯者按：Schlesinger 將消息來源的方法區分為內部途徑和外部途徑，所謂外部途徑就是從消息來源著手，分析其接近媒介所使用的策略等)、較不以媒介為中心來研究消息來源的方法，以及他們那些被視為在「競爭性領域」內組織而成的「策略性活動」。儘管國家與有力機構所享有的物質性與象徵性優勢已為人所熟知，他還是認可非官方消息來源活動的重要性。

認為消息來源佔據競逐媒介近用權的領域是必要

的，但是在這個領域內，物質性與象徵性優勢卻呈不平等地散布。然而，最佔優勢的並無法保障憑藉他們地位而來的初級定義權；相反地，倘若消息來源真的得到這個優勢，那是因為他們在一個不完全競爭的領域裡，成功地運用了策略性行動的緣故(Schlesinger 1990: 77)。

當如是設想時，在理論上與實證上，則缺乏了一種固定觀點，攸關於僅被社會支配地位保障的定義優勢。史勒辛格(Schlesinger 1990: 66-7)接納了「初級界定者」的論點而不考慮以下事項：

1. 不同官方消息來源之間的爭論；
2. 消息來源的幕後謀略，藉由對文本的文化主義式解讀，而被以方法論的方式呈現出來；
3. 在享有特權的菁英階級內，主要消息來源的競爭性與轉換性本質；
4. 近用權結構裡更為長期的轉換；
5. 假定一個源自媒介權力中心的單向定義流。

這些更加複雜的、針對消息來源權力與策略性活動的觀點，因此影響了愈來愈多關於不同「競爭性領域」的實證研究，包括環保壓力團體的研究(Anderson 1993, Hansen 1993a)、專研 HIV 病毒/愛滋病領域的健康專業研究(Miller and Williams 1993)、刑事審判領域裡的互競壓力團體與專業利益研究(Ericson *et al.* 1989; Schlesinger and Tumber 1994)、在自願部門中工作的非官方消息來源研究(Deacon 1996)、政黨與壓力團體針對爭議性政府政策的爭論研究(Deacon and Golding 1994)、在北

愛爾蘭的「動亂」下貿易聯盟的情況，以及國家和其他消息來源之間複雜的(而且是隨歷史變遷的)互動研究(Miller 1993, 1994)。

假如這些主要以英國為基礎的研究隱晦地質疑了：在不處理相關背景與策略性活動的情況下，還能確保菁英取得近用權的早期位置；那麼，主要以美國為基礎的研究則強調菁英政治共識的易變本質，以及其如何形塑新聞近用權的過程與型態。班尼特(Lance Bennett 1990: 106)明確地闡述了新聞近用權的「指標」模式如下：「大眾媒介的新聞專業，從新聞室到新聞路線，皆傾向根據主流政府論述針對該主題所持的看法，在新聞與編輯之中呈現不同的聲音與觀點。」換句話說，該模式維繫了當時菁英的政治共識，而新聞媒體將傾向支持政府政策，並接近那些表露支持之意的聲音；然而，當時的菁英所反對的論點，新聞媒體也會將注意力從該處移開，並且準備接近更大範圍的論調，甚至更有勇氣去接受涉入性與挑戰性較高的論述。一個針對媒體報導越戰(Hallin 1986)、薩爾瓦多(EI Salvador)(Bennett 1990; Hallin 1994; Pedelty 1995)、波斯灣戰爭(Bennett and Paletz 1994; Wolfsfeld 1997)，以及關於北愛爾蘭媒體所進行的深度且長時間研究，報導中所形成之「共識的孔隙」(Butler 1995)，皆支持了上述論點。迪肯與高定贊成這種模式，並將注意力集中在菁英來源裡，專家或「仲裁者」與「提倡者」之間的分別。透過專家，新聞媒體可建立起「合法性」，這意味著，針對特殊的爭議或議題，將可透過「提倡者」來增進論述與意見中已成型的評論，並且促成強烈的影響力(Deacon and Golding 1994: 15-17)。

在這些不同的方式中，上述所提到的研究幫助我們將注意力從媒介中心的觀點，轉移至檢視相互競逐之利益間的複雜性，以及形成新聞近用與再現的短暫過程之上。簡而言之，在

消息來源策略與政治偶發事件之中，可以發現單單只有社會主流足以確保成功的新聞進入(news entry)。說得更清楚一點，就理論而言，沒有上述的任何一位作者，能減緩資源的不平等、在來源場域中所分配到的社會可信度或合法性，也無法削弱他們在新聞近用過程中不受間斷的影響力。儘管如此，他們同樣指出多重因素與隨著時間而顯露出來的政治偶發事件，只要在事前透過經驗性的驗證，並進行適當的理解，事實上是簡單地預測的。無疑地，針對媒介消息來源，這些具有說服力、深入剖析且必要的社會學取徑，在接近文化典範的觀點時，他們似乎將新聞形塑的影響力，低估為一種文化中介與符號表徵的形式，因此它們仍有欠缺與不足。在此，我們必須轉向那些在更為廣泛的文化典範定位下執行的研究。

## 伍、媒介消息來源與象徵性權力

如我們所見，社會學典範追尋的是媒介消息來源的問題，以及原則上依據新聞產製者的行為與策略性干預的來源而成的新聞近用。從文化學者的觀點來看，這欠缺一種概念，即新聞在文化上所帶有的中介性本質，不應只被視為社會利益與政治權力的密碼，更應將其特殊的組成方式，視為傳播的文化中介體與符號的提供者。針對故事及敘事的結構形式所進行的文化研究，我們應進行更為文本式的細膩描繪，有些研究者已經開始追尋新聞的文化本質，藉此開啟對新聞，更為深入的檢視消息來源涉入(source involvement)。

### 一、故事、迷思與敘事

如同所有記者所知，「新聞故事」(news story)是他們專業活動的核心。例如傑克布曾論述到，「『敘事』是構成新聞的核心因素」(Jacobs 1996: 73)，並且延續了說故事的傳統。長久以來，這個傳統提供了方法，讓社會能說故事，並為自己重述故事中所帶有的基本迷思，藉此重新肯定自己是一個集合體，或是一個「想像的群體」(Smith 1979; Barkin and Gurevitch 1987; Campbell 1987; Bird and Dardenne 1988; Bird 1999)。透過這種方式，新聞成為一種象徵系統，相較於鑲嵌在故事形式之中，神話式「真實」的重述，特定「故事」的資訊性內容變得較不重要：如柏德與達汀論及，「新聞故事，就像神話故事一樣，不是『以它像甚麼樣子陳述它』，而是『以它的意義陳述它』」(Bird and Dardenne, 1988: 337)。

很明顯地，這與理解媒介消息來源以及新聞涉入有關。根據柏格懷茲的論點，「新聞工作者根據新聞故事主題，發展一套心靈的目錄，包括如何『策劃』，將會導致真正的破壞，以及哪些可能成為關鍵因素」。柏德與達汀也指出關於近用新聞「故事」的隱喻，以及新聞在更普遍情形之下所扮演的神秘角色。

在新聞產製之中，記者不僅僅使用文化決定的定義，他們也必須將新的情境套入舊的定義。這也是記者將人們與事件，置入既存的類型，如英雄、善惡、並且賦予故事神話性真理的權威。(Bird and Dardenne 1988: 345; 另請參閱 Lule 1997)

蘭格(John Langer)在他關於通俗電視的研究中亦指出，當它論及「記者喜歡討論新聞感知能力的程度，與談論『形式』在制度化認可的內容中所佔的優先性相關」(Langer 1998: 133)。他的研究詳述了新聞論述中如「名人」、「普通人」與「受害者」

所帶有的受限位置，這些人在小報新聞故事的迷思結構裡，象徵性地處於標準化的角色中。然而，這些象徵性的角色，卻並未對抗流行與流行化形式的新聞學。

## 16 二、媒介事件：劇本與角色

戴恩(Daniel Dayan)與凱茲(Elihu Katz)在其研究《媒介事件現場廣播的歷史》(*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1992)中，檢視那些事先計畫、現場播送，以及一般性陳述的例行性廣播，如節慶的聲明或者其他重大事件(所謂大眾傳播的「重要節日」)等一致性干擾。這使得歷史事件的廣播形成一種文類形式；更甚者，這種文類因此決定了播報的角色與情境形式。戴恩與凱茲針對「媒介事件」此目錄，識別出三種文類：競賽或史詩般的政治與運動競賽(如水門案、世界盃、奧林匹克運動會)；征服或所謂的領袖型任務(如登陸月球與埃及總統薩達特訪問以色列)；以及加冕儀式或偉大事件的傳承儀式(如伊麗莎白女皇二世的加冕儀式、查爾斯王子的婚禮或戴安娜王妃的葬禮)。

事件的主體可被分為競賽、征服與加冕儀式三種。這些是事件的形式，或者在該文類中建構主要述事可能性的「劇本」。它們決定了各種事件中的角色分配，以及他們將如何被扮演。

整體而言，這些作者辨別出敘事與說故事之中的結構性力量，以及如何明顯地將新聞行動者象徵性地置於廣大的文化迷思之下。然而從社會學觀點來看，他們冒險地將新聞結構與文化迷思具體化，並將其視為一種看似永恆不變的穩定結構，這

種結構則處於歷史性活動的權力，以及競逐之中的社會利益所具備的策略性干預與奮鬥之外。

### 三、「後新聞學」：在近用之後？

有些理論家在他們的理論創立中，更進一步討論形式的權力，並指出新聞的傳統形式現在已有效關注媒介消息來源與過度的新聞近用。例如阿塞德察覺到，產製出新聞標準化格式的廣義「媒介邏輯」，成為如何編寫故事，以及消息來源如何產生作用的條件(Altheide 1995; Altheide and Snow 1979, 1991)。因此，這種針對媒介格式所產生的全面滲透性影響，成為社會中其他競逐場域的條件，無論是政治或者運動，皆產製出一種「後現代」時期與「後新聞學」(postjournalism) 實際上就是「在近用之後」的情形。在「後新聞學」中，政客與其他相關人士屈服於媒介邏輯與媒介格式之下，因此為娛樂以及商業導向的媒介提供所需的新聞內容 而這也敲響了獨立新聞學與調查型新聞學的喪鐘。

阿塞德的論述是否過於悲觀，其論述是否過於概化？今日的新聞生態學，在某些格式與政治論點上至少仍持續顯示相異之處，彼此競逐的社會利益亦發覺必須進入新聞領域，也多少須參與關於他者的定義、詮釋與慣例過程，策略性地贏得一些定義的機會，所以這種認為我們逐漸進入「後新聞學時代」這個毀滅性局面的結論，就顯得過於草率。

## 陸、媒介消息來源與傳播權力

最後，透過社會學與文化取徑(如上所述)之外的某些觀

點，我們將涉及一些構築於其上的研究。在設定研究的同時，這些研究展現一種對於「傳播權力」可能性的高度關注。此處，根據社會利益之權力展現而生的廣泛性社會學重點，在競爭的來源場域，以及在媒介中策略性地追求定義性優勢之中，擴展成一種檢視權力如何在傳播實踐中運作的方式。文化學者對文本形式與傳統所產生的敏銳度，以及這些如何「中介」消息來源的參與，亦浮上眼前，但目前為止，他們仍保持著封閉與決定論的觀點。在制定的過程中探討傳播行動的形式，這種強調轉向更為政治偶發的，以及在傳播上較不事先安排或可預測的結果。中介式的傳播行動奠基於展演、制度性機會與參與者的互動性交流之上，而不是閱讀靜態文化形式的文本與迷思，或者固定形式之故事類型、劇本與指派角色等等封閉性的文本決定。再次陳述，這種取徑與「傳播權力」之間的差異、社會學取徑與「策略性」權力之間的差異、以及文化取徑與「象徵性」權力之間的差異，不應被視為相互獨立的，而應該藉此捕捉頗具洞見且值得重視的重要差異。

### 一、中介儀式、醜聞與公共展演

關於新聞的中介儀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展演，皆強調了這些因素通常涉及隨著時間而展露的動態過程與社會緊張情勢。在遠離涂爾幹的術語——亦即透過重新建立社會共識與維持現狀，「整合」社會秩序，理論家表示中介「儀式」也可為衝突的利益服務，並潛在地帶有變化性質(Elliott 1980; Chaney 1986; Wagner-Pacifici 1986; Alexander 1988; Alexander and Jacobs 1998; Ettema 1990; Jacobs 1996; Hunt 1999; Cottle forthcoming)。在此，「儀式」的過程性觀點就此開展，在儀式中，劇本並不單獨屬於新聞產製者或任何特定消息來源，而「儀式」通常在一個進



行中的「社會戲劇」(social drama)裡動員與競逐。「社會戲劇」這個概念是由人類學者透納(Turner 1969, 1974)所發展而成，此概念協助我們描繪社會衝突是如何隨著時間而演變，其中包含不同的政治機會與風險，以及將多樣的社會行動者與公共展演中有權的機構，納入他們的抗爭之中，藉此維持或贏得合法性與支持。

我以社會戲劇這個概念，作為一種描述與分析造成社會衝突之事件的方式。以最簡單的方式而言，戲劇由一種四階層模式所構成，首先，從某些社會關係的裂縫中開始，這些社會關係在相關的社會群體中是極為重要的，社會群體不僅提供關係所需的環境背景，亦提供關係所欲達成的目標。接著迅速經歷群體分歧成兩個主要方向的危機之後，便開始採納合法化或儀式性手段，矯正或調解造成此衝突現象的兩方人馬。最後一個階段，即公開性或象徵性地表達調停之意，或者表達無可挽回的分裂(Turner 1974:78-9)。

18

透納的社會戲劇概念，已被應用在許多關於媒介衝突的研究當中，公共犯罪也經常與儀式性的元素產生高度相關。包括針對美國水門事件之媒體揭露所作的研究(Alexander 1988)、義大利恐怖行動與阿多莫羅(Aldo Moro，譯者按：一九七八年擔任義大利總理)綁票致死案(Wagner-Pacifici 1998)、英國媒體的報導成果以及針對由愛爾蘭共和軍(IRA)發動之恐怖行動所作的報導(Elliott 1980)、針對美國境內種族關係的衝突故事所作的報導(Ettema 1990)、媒體報導一九九三年四月倫敦發生的謀殺案，一位年輕人-史帝夫羅倫斯被種族主義者謀殺，以及一連串針對這些事件的制度性與文化性回應(Cottle, forthcoming)。

這些中介儀式的個案研究指出，當我們透過這種更為進程式的觀點時，新的近用管道與消息來源權力的運作方式，將在政治上更為複雜且難以預測。政治上的突發事件以及「風險」，也參與了中介醜聞，由媒介傳播的現代形式所帶來的「可見度的轉型」，剝奪了用來駕馭權力之強大且迅速的公共展演(Thompson 1995, 2000)。

政治醜聞不僅僅是個人悲劇：政治醜聞也是存在於象徵性領域中社會競爭，關於揭露的真相、主張以及否認，存在於主張與反訴之內外，甚至背離了主張與反訴。它們是擁有自己主導者的競爭，在一連串表露的事件中各自追求自己的策略，超越涉及該事件的個人。幸虧媒體，讓無數的其他人得以在公開舞台中看見、聽見與理解該事件(Thompson, 2000: 7)。

在媒體中介醜聞的情況下，一旦再次強調意外事件的真實性，以及展演中所涉及的政治「風險」，媒體與消息來源權力之間的平衡將可輕易地轉移。

## 柒、談話的形式：互動式、溝通式與審議式

如我們所見，符號互動論這個早期概念所帶來的影響，對社會學中關於「策略力量」的晚期發展，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象徵式力量」產生了作用。高夫曼(Erving Goffman)也將人類互動或「衝突」定義為「社會學中的初級場景」(Goffman 1963)，在這種衝突的過程中，再造了人類關係與意義，也再製了角色與身分地位。針對這種「衝突」而形成的關注，因此成為人類學、

對話分析、以及大量研究媒介場景中，關於「互動中的對話」(talk-in-interaction)裡的理論發展。若加以整合上述論點，則可為我們的「傳播行動」中第三個「崛起中的」方法典範做出貢獻，此「傳播行動」將針對中介式談話的形式，以及廣播所帶有的制度性本質，產生新的深入觀察。例如聚焦於新聞訪問中所執行的談話形式，可顯露出這些形式所帶有的制度化現象，意即針對訪談者和受訪者之間，某些關於發言權、議題設定與議題移轉的程序，進行管制化與自然化的情形。更甚者，這揭露出上述現象，以及在訪談的執行過程中其他具有權力的特質，對涉及該事件的人而言，近用的程度則大大不同(Greatbatch 1986; Heritage and Greatbatch 1993; Clayman 2002)。

因這種廣播形式的談話而產生的關注，史坎內爾(Paddy Scannell)歷史性地與系統性地針對這種關注進行文本化，恢復電台中不同節目形式的「溝通意圖」，並且談論這種溝通意圖是如何在播送者與觀眾這種早期遙遠且權威式的關係中，轉向更為平等、開放且易得性更高的關係(Scannell 1992, 1996, 2003)。這種在傳播特質中橫跨多年的轉變，部分已經透過深入瞭解並以同理心的方式參與節目，而獲得揭露。

在注意廣播活動的制度性特色時，透過下列三種研究：(1)傳播權力的分配；(2)參與者的地位與展演角色；(3)談話的組織與控制，我們可以清楚發現權力如何在其中運作(Scannell 1996: 18-19)。

在談話的廣播形式這種歷史性的東山再起中，最迷人的特色在於「生動性」(liveness)的表現方式，以及不事先寫稿與自動自發的談話本質，製造更多答辯和參與討論的機會。

電視新聞的不同形式，以及最近關於事件的節目，例行性地建構了演出、近用的層級，以及參與談話的些許可能性，以及為了「利益」而蓄意偷聽與監視觀眾。這些都是「民主性深化」過程中的重要資源(Giddens 1994)，與發展一種更為審議式的民主(Dryzek 2000)。觀察電視新聞這種表演式的建構，可幫助揭示這些結構如何規範、壓迫、促進公共闡述，並針對偷聽或監視觀眾後所產生的歧異觀點與利益，進行對話式互動，以及展現公共參與的表演特質(Cottle 2001, 2002)。

對「傳播權力」進行思考，帶領我們實際檢視中介式衝突與參與者互動，是如何多面向地運作與表演，以及他們是如何受到互動發生之處的制度性安排與系統性規範所壓迫。理論決定論者通常過於僵固地假設意識或文本的終止形式，持媒體中介者的看法恰好與理論決定論者相反，其認為透過觀察談話的  
20 形式，可以發現許多偶發事件與機會皆參與了公共性衝突，而非被圍限於其內容。

## 捌、媒介 - 消息來源典範：摘要

如我們所見，在社會學典範下工作的研究者，傾向於調查策略與定義性權力的媒介 - 消息來源互動，檢視新聞近用的模式，以及各種產製公共知識的情形。另一方面，在文化典範下工作的研究者，傾向針對文化再現中的新聞近用進行理論化，並且對於新聞行動者的象徵性角色十分敏感，以及如何根據新聞 - 故事的傳統、敘事與形式，為這些行動者定位，藉此為大眾文化中引起共鳴的廣泛文化迷思做出貢獻，並維持此現象。

這些廣大的典範性差異，根植於社會科學與人性之間的學術分歧。在擁有多重準則面向的媒介傳播中，持續建構大量工

作分歧的 針對媒介消息來源與新聞近用，提供強而有力的正面觀點。當社會學典範鼓勵我們觀察政治中公共再現(明顯地欺騙)的角色時，文化典範邀請我們觀察涵納於政治再現中(在文本上更帶有欺騙意涵)的文化形式與象徵。

崛起中的第三個典範 溝通式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與前兩種典範保持合作卻又疏離的姿態，溝通式行動檢視的是制定過程中的溝通權力。觀察儀式性過程的動態性與偶發性，媒介再現的制度性形式中的現場展演與參與式衝突，這種研究開瞭了一種更為進程性，而較不具決定論觀點的媒介參與，將媒介參與和展演的研究，帶回涉及策略性利益、傳播行動的制定、政治奮鬥的偶發性以及媒介形式之複雜性的世界中。

藉由這三種關於媒介消息來源與其它們在新聞場域中的互動，所形成的廣泛理論性導向，我們現在可以重整裝備，思考近期針對此領域有所貢獻的研究，以及這些研究如何加深我們對於這種調查之特殊性的理解。

## 拾、本書的計畫

《新聞學與公共關係》一書主要由五個部分組成，每一個部分都為本書提供整體的主題式取徑。第二部分「**促銷時代：公共關係的成長**」，帶領讀者進入公共關係之中較為廣泛的領域，並且顯露此領域近年來以指數方式進行的極速發展。第二章則具體描繪英國公共關係的崛起，探究公共關係對媒體的影響 如消息來源互動與新聞產製實踐，並加以理論化。戴維斯(Davis Aeron)觀察到許多組織已開始採用公共關係，做為達成媒體報導中某些目標的方式。同時，媒介機構經歷更為緊縮的編輯預算，因此越來越仰賴外部消息來源所提供的資訊。這兩個

趨勢意外造成專業公共關係部門興起，並且改變了消息來源近用的模式。因此，戴維斯檢視公共關係是否僅是制度性與合作性組織藉以保障近用優勢的另一種方法，或者事實上，上述論及的改變，再現了非官方消息來源也能夠近用媒介的新方法。

接續著前二章關於消息來源的主要部分，第三部分「**消息來源場域：優勢利益**」首先檢視優勢機構與利益 國家、政黨、軍隊，這些機構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事先控制與操弄新聞議題。當然，這長久以來已被批判媒介理論的學者所關注，並且提出「可信度階層」、享有特權的「菁英近用」與「首要定義」這些具影響力的概念。此部份涵納三個觀察此現象的章節。由鮑伯法蘭克林(Bob Franklin)所撰寫的第三章「埋葬壞消息的好日子？」：記者、新聞來源與政治包裝，檢視政治傳播中的重要角力場所，特別關注英國政黨政治傳播策略，與國家和在地層級管控新聞的諸多嘗試。此部分的討論，奠基於一種視今日媒體為構成整體所不可或缺，甚至是政治之一部分的想法。根據法蘭克林的說法，政治漸漸受到「包裝」(packaged)，在瞭解媒體運作是根據一系列不同的優先次序與邏輯之後，政黨與政客逐漸試圖拓展其控制媒介再現的程度。儘管法蘭克福提出國家與在地媒體的重大差異與複雜性 政黨互動，他仍根據其最近的研究，確認自己對於「包裝」政治的概略假設。在全國層級之下，一個分析勞工處與記者之間關係的研究顯示消息來源所具備的優勢，但在另一個從在地層級分析記者與政黨之間關係的研究，則顯示在地媒體與記者所握有的優勢。

由菲利浦泰勒(Philip Taylor)所寫的第四章 烽火下的新聞業：戰爭與國際危機報導，歷史性地檢視作為新聞業特徵的競爭性利益、戰時軍隊與政府的互動，以及一觸即發的國際危機。關於外國事務的公共知識，包含戰爭與國際危機，皆大大仰賴大眾媒體。然而，泰勒則提出問題，究竟有多少公共理解，瞭

解媒介與該事件互動、以及報導該事件的方式呢？泰勒熟練地描繪戰爭報導，以及從克里米亞戰爭到波斯灣戰爭所帶來的危機，以及最近期的波西尼亞與科索沃的戰爭、還有因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而衍生的「反恐戰爭」，這些在記者、政府與軍隊之間轉變的關係(有時是難以描繪的)。此處，在媒介與國家之間相互競爭的邏輯，以及造成此現象的資訊管理策略，透過歷史性探索，將揭露出隨著時間與不同戰爭和國際危機而來的延續與改變。

由沃斯斐德(Gadi Wolfsfeld)撰寫的第五章 政治競爭模型，羅列了他極具影響力的模型，該模型分析了政治衝突與媒介，並開始指出決定媒介再現衝突的關鍵因素與政治偶發事件。沃斯斐德觀察到儘管優勢團體握有工具優勢，媒介並非以線性或固定不變的方式進行衝突報導。他說，有時媒介這個角力場域彷彿被政府官員所濫用，官員在此炫耀他們華麗的衣裳與武器；在其他時刻，媒介又像是一個為火爆比賽提供空間的場域，挑戰者與當權者擺好架式，在其中展開殘忍的戰役；在某些時刻，媒介又成為上演悲慘道德戲劇的劇場，展演了受壓迫的苦痛與亟需社會改變的需求。沃斯斐德這章節的目標，在於根據對於政治、社會與情境因素的理解，解釋媒介如何以及為何在政治衝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此章能在政治上與歷史上開啟一種對於菁英、挑戰者與新聞近用的細緻理解。帶領我們進入接下來兩個關於消息來源範疇的部分。

第四部分「消息來源範疇：挑戰者」，則專注於在社會結構中佔據多樣化位置，卻完全被優勢國家與政府組織正式排除在外的不同團體與利益。狄肯(David Deacon)所著的第六章 非政府組織與媒介，將前三章的經驗性關注，轉移至媒介傳播文學、以及關於媒介 消息來源的力量中經常遭忽略的諸多組織與利益。透過比較性研究，以及詳細觀察貿易聯盟、自願/慈善

組織、以及半自主性的非政府組織(quangos)，狄肯針對消息來源如何與媒介互動、以及對結果造成何種影響，藉經驗提供一個更為細緻，在理論上更具分辨性的分析。狄肯的章節替這個極具重要性、但直到最近仍相對較少受到討論的新聞消息來源互動，提供一個受歡迎且具權威性的討論。

由安德森(Alison Anderson)所撰寫的第七章 環境行動主義與新聞媒介，在她針對環保壓力團體與生態保育活動的討論中，亦檢視了文本中的非官方消息來源，在這些環保壓力團體與生態保育活動中，可能存在著一些在當今社會中極為成功的「挑戰者」(challenger)團體。根據經驗性調查與研究，安德森表示：這些壓力團體展現不同的消息來源策略；他們對主流媒介帶有敵意；並且使用另類傳播管道，包含網路活動者使用網際網路。藉由描繪英國與其他地區的實際例子，遂形成以下針對此複雜性而生的分析討論：環保團體與行動者尋求保衛他們的媒體再現，這麼做的原因是為了最後在新聞報導中的再現。

上述兩章節與實例幫助我們為下述概念提出例證，儘管缺乏資金、組織能力與社會聲望，社會中挑戰者團體的聲音與觀點，有時能在新聞近用與再現這個危險場域中獲得立足點，而這些挑戰者團體也能提供原因，讓我們理解為何以及在何種情況下他們站出來。

最後，第五部分「中介再現及參與」提供兩個章節，探索電視小報新聞的文化形式，以及電視新聞、中介近用、再現與參與的「審議式建構」。由蘭格(John Langer)撰寫的第八章 電視與新聞文化小報化：近用權與再現，也檢視了非菁英新聞近用與新聞再現。然而，關於新聞如何透過性格揭露與新聞故事的公式化使用，來描述「一般人」，他邀請我們針對此現象進行文本化與闡釋，無論該報導是悲劇、災難或者特殊事件的發生。透過提供資訊與公眾觀點而成的新聞民主模式來看，這些新聞



報導種類，將被視為「毫無價值」的報導而加以拋棄，蘭格認為必須認真深入檢視小報新聞的本質與吸引力、以及新聞與每日生活之間的關係。這個討論檢視電視小報新聞透過文化解讀而來的近用考量與再現，並且幫助我們解釋這種受歡迎新聞形式的慣例，以及它如何形塑與象徵性地定位新聞入口。

來到本書的尾聲，柯特(Simon Cottle)撰寫的第九章 電視新聞與審議式民主：中介傳播的行動，檢視電視新聞的傳統化建構如何形塑與決定公共化展演和獲得近用管道的衝突聲音。透過「風險社會」這個新的主要議題、反世界貿易組織示威運動、以及關於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的各項活動與政治效應等例證，柯特證明電視新聞的呈現方式，能針對衝突性的政治觀點與文化概述進行壓迫，亦可促進公共闡述與參與對話。柯特認為，新聞的形式與目前現存的節目方式，對監聽與監看觀眾而言產生重要的潛在貢獻，因此可被認為是拓展「民主式深化」與「審議式民主」這些值得今日媒介學者重視之領域的關鍵因素。

綜觀這些部分，提供我們去多方理解媒介的複雜性 消息來源互動、公共關係策略、以及媒介再現與參與的形式。如我們所聽聞，關於媒介消息來源的研究，構成一個豐饒的研究領域，並且包括對以下領域進行廣泛的思考：「促銷時代」的興起與媒介在公共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從不同的消息來源與可能造成的結果中，理解今日新媒介採納的公共關係策略，如何以及為何重要的原因；新聞近用的形式、文化再現的形式、與新媒介中偶發的公共展演和衝突形式。深入觀察這些領域，我們得以針對媒介、消息來源所握有的相對權力，以及它們在瓦解今日尋求公共認同、合法性與新媒介支持的衝突利益與認知所做的貢獻。

## 24 本章摘要

- 關於媒介的研究 消息來源互動、公共關係策略，與媒介近用和參與，成為今日社會中媒介與消息來源之相對權力的辯論核心。
- 傳統自由民主理論所共同持有的訓諭，意即媒介自由受到保障，因此得以發表不同的觀點、由「代議式」民主過程所促成的意見，以及挑戰新媒介當中偏好菁英觀點的批判理論，承認社會不平等與/或反對邁向參與式民主的觀點，這兩者在媒介消息來源涉入與再現中，共享一個基礎的關注。
- 目前，有三種典範構成媒介的傳播研究範疇 消息來源互動、再現與參與。社會學典範通常關注消息來源如何策略性地追求對媒體的影響力，以及確保「定義上的優勢」。文化典範追尋媒介描繪與近用之中的再現本質，並且檢視關於「象徵力量」的問題。正在興起的「溝通式」典範，著眼於「傳播力量」的形式，以及這些力量如何在媒介形式與衝突的可能性中運作。
- 在今日的促銷式與「公共關係式」社會中，相互競爭的利益與文化認同為了追求自身的宣稱與目標，彼此碰撞而喧嘩不已，藉此獲得公共認同、支持與合法性，媒介因此成為執行傳播行動的核心場域。
- 今日關於媒介 消息來源互動與關係的研究，必須參與：(1)不同消息來源場域的複雜性，以及這些策略性利益如何在新媒介當中被動員；(2)競爭的政治可能性，以及其涉及的暫時性過程；(3)傳遞媒介的文化形式與邏輯；(4)媒介當中傳播行動的制定。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版與未來正式上市版本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此書在正式上市時能即時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

